

爲自由獨立幸福的中國而奮鬥

王明著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再版

爲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

陳紹禹
(王明)著

1. 中國國家和人民的地位
2.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
3. 爲蘇維埃政權而戰鬥的九年
4. 新環境與中共爲新中國而奮鬥的新政策
5. 爲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而奮鬥

爲獨立自由之幸福奮鬥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月初版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再版

實價國幣一角五分

著者 王 明

發行者 南華出版社
上海四馬路

總經售 大公書局
香港皇后大道中

三十七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爲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

今年七月底八月初，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十五週年紀念。在第一次大會時，中國共產黨總共只有幾十個黨員。在一九二五年革命的前夜，就是在「五卅」事變以前，黨還不過只有不上一千的黨員（大約九百多人），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最發展的時候，黨有了幾萬黨員（大約六萬人）。現在中國共產黨不僅有幾十萬黨員，不僅在國內一部份領土裏領導着紅軍和蘇維埃，而且成爲團結全中國人民去實行抗日救國的發起者。

不錯，比起中國客觀條件的可能來，比起偉大的中國人民的需要來，特別是比起中國現在的空前民族危機的狀況來，中國共產黨十五年來爲解放中國和中國人民奮鬥所達到的成績，還是很小的和很不夠的。然而，中國共產黨在十五年過程當中

，能夠從很小的宣傳共產主義的小組，生長成爲真正羣衆的政黨；同時，全世界帝國主義和中國反革命的力量，不僅不能消滅中國蘇維埃和紅軍，而且簡直無法停止中國紅軍和蘇維埃力量的增長；所有這一切，明顯地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不可戰勝的力量。

爲什麼中國共產黨有這種不可戰勝的力量呢？首先因爲他是最先進革命階級的政黨，他百折不回地爲全體中國人民的基本利益而奮鬥，爲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而奮鬥，爲中國人民的獨立，自由和幸福而奮鬥，因此他就能取得廣大中國民衆的信仰和擁護。

一 中國國家和人民的地位

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其領土面積只小於蘇聯。中國人民是地球上最多的人，差不多佔全人類五分之一以上，中國的文化，是全世界人類歷史上一種最古的

文化。中國人民，是愛好勞動，偉大胸襟和異常能幹的人民。中國人民當中，有許多偉大天才的思想家、哲學家、著作家、詩人、藝術家、軍事專家和發明家。然而在十九世紀時，由於歐美資本主義的發展，由於歐美資本主義的侵入東方，中國便暴露出了自己經濟上的落後性，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社會和文化方面的落後性。由於這種落後，我們中國人受盡了外人的打擊，首先是英國人打了我們（所謂一八四二年中英鴉片戰爭）；然後英國和法國人合同一齊打了我們（所謂一八六〇年的英法聯軍進攻中國之役）；然後甚至於三島小日本——幾千年來受中國文化培養薰陶的日本，歷史上尊敬中國爲『天朝』的日本，也打了我們一頓，（就是所謂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從此以後，特別是中日戰爭以後，中國的弱點完全暴露出來了，所以大家都看不起我們中國人，所以大家都敢於欺負我們中國人。因此，一九〇〇年的時候，西方和東方的大小帝國主義者聯合起來打我們中國人（即所謂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之役）。在中國當時統治的腐朽的滿清及其精神上和肉體上都完全腐敗了的軍隊

，不能對於外國侵略者實行真正嚴重的抵抗，而滿清所實行的反中國和反人民的政策即所謂『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政策，更加緊了外國強盜對中國的侵略和壓迫。滿清在外寇的槍刀逼迫之下，簽訂了各種不平等條約，根據這些條約，中國支付了而且到現在還在支付着大量的軍事賠款；根據這些條約，中國開闢了一切最好的江海口岸，讓外國的商品，資本和軍艦自由地侵入；根據這些條約，中國喪失了海關自主；根據這些條約，中國把最富藏的礦山都出租給外人成爲租借地，外國強盜們在中國整個活的肌體上實行分割，東西南北各方面的邊疆和藩屬都被割去了。外國強盜們把中國最好的地方搶去了，在那些地方開闢所謂外國租界，這些租界，無論在實際上，無論在『法律上』，都是國家內的國家，外國強盜們把中國的一切經濟命脈都搶握在自己手裏，他們在實際上監督着中國的財政稅收和進出口。在保護僑民生命財產的藉口之上，這些強盜們在中國的最心腹之地，經常地駐紮着大批的海陸空軍。這樣一來，中國人民最痛恨的外國強盜，把中國當他們自己的家裏一樣來

隨意支配，而我們中國人自己在自己的家裏，反轉來由主人翁變成了奴隸。於是中國由獨立國變成了外國帝國主義國家的半殖民地，中國人由自由的人民變成了半殖民地的奴隸。因此，在最近一百年來。中國人民總是百折不回地爲解除自己這種被屈辱的被壓迫的半殖民地的狀況而奮鬥，這絕不是偶然的一回事。

同時，中國的生產力被最野蠻的君主政體和軍閥官僚制度束縛着。當時雖然在所謂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而且建立了民主共和國；但是，在中國原先統治着中世紀黑暗的滿清專制政體，然後除了辛亥革命後很短的時期試行民主共和外，又統治着封建性的軍閥官僚制度。中國人民對於國家盡了各種可能的和難堪的義務，但是中國人民沒有最低限度的人權。因此，中國人民迫切地爲取得政治自由和人權而奮鬥。這絕不是偶然的一回事。

經濟的落後，民族的被壓迫和政治的黑暗，使中國走到一種非常貧弱的地位，絕大多數的中國人經常地挨餓受凍，每年有幾百萬人甚至幾千萬人因所謂天災（水旱

蟲災·傳染病等)而死亡而流離失所。中國的統治階級經常不注意建設真正合乎國家需要的國防力，他們把國家的收入多半用在無益的消耗和個人私囊，因此不能建立強有力的軍隊去抵抗外國敵人的侵略；因此，中國就變成了外國經常侵略和進攻的對象。而正因為如此，所以中國人民異常迫切地找尋各種方法和道路，以便把貧弱的中國變成豐強的中國，就是使中國變成人民無飢寒交迫之苦而能過飽暖生活的國家，以及使中國變成有充足的國防力，能夠打退一切外敵進攻和保護自己的每寸土地和每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的國家，中國人民迫切希望中國由貧弱變成富強的國家，以便能享有幸福的生活，這完全不是偶然的一回事。

在中國近百年史的篇幅上，充滿了中國人民為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鬥爭。農
民革命的太平天國（一八五〇——一八六五年），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起義，一九一一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九年的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中國人民為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的具體反映

。而在一九二〇——二二年時，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爲中國人民解放而奮鬥的先驅戰士了。中國共產黨十五年奮鬥的歷史，雖然在中國革命各個階段和時期中，根據主觀及客觀條件的變動，有過各種政策和策略上的變更，但實際上就是爲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的十五年的歷史，這當然絕不是偶然的一回事。

二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

中國共產黨是科學共產主義的黨，他與一切烏托邦學說和派別根本不同。他在決定每個國家革命鬥爭的戰略和策略時，絕不僅僅是從共產主義者自己的主觀願望和素望作出發點，而是根據這一個國家的特點，根據這個國家的民族的、經濟的、政治的、歷史傳統的、社會生活的、文化的各種條件的特點；根據每個國家每個歷史環境具體階級力量對比的相互關係；根據每個歷史時期中民衆政治覺悟性、組織性和戰鬥經驗的程度等。作爲決定自己戰略和策略的出發點。正因爲如此，所以中

國共產黨不僅自始至終完全了解和相信：只有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能夠把中國人民從被壓迫和剝削之下，真正完全解放出來；而且同時中國共產黨員也完全了解和認為有為中國人民利益的每一個進步的事業而奮鬥的必要。正因為如此，所以中國共產黨還在其開始成立的時期中，不僅在政治上能把自己形成為承認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為最後奮鬥目標的工人階級的政黨（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開的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而且能夠很快地規定出組織民主統一戰線，以及適合於當時中國廣大民衆需要的具體行動綱領（一九二二年七月在西湖開的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政治綱領，有很大的歷史意義。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上，中國人民在基本上就是為實現我們黨二次大會通過的行動綱領而奮鬥，即是為反對封建軍閥，為反對帝國主義，為中國民族國家獨立，為建立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為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等自由，為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記名投票的選舉權，為八小時工作制，為減租減賦，為取消厘金和苛捐

雜稅，爲男女平等和改良教育制度等等要求底實現而奮鬥。

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在廣東開的第三次黨的大會上，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領導和幫助之下，已經能夠規定出爲實現自己行動綱領底具體的政治的和策略的方針。這個政治策略方針的根本內容和特點，就是組織民族統一戰線去反對半殖民地中國底基本敵人——外國帝國主義。

一九二五年一月開的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進一步地肯定了建立反帝民族聯合戰綫政策的正確，總結了國共合作的初步經驗，嚴重地討論了黨的羣衆宣傳鼓動工作和組織工農學生羣衆的問題，準備黨和羣衆去迎接行將到來的偉大的革命戰鬥。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政治協定，共產黨贊助國民黨改組，共產黨員加入當時代表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反帝聯盟的國民黨，爲建立臨時革命政府，爲建立國民革命軍，爲建立廣東革命根據地等而奮鬥；實行國民會議促進會運動，贊助國民革命軍反對北洋軍閥的北伐在反帝和反軍閥的鬥爭中，實行教育和

組織工農羣衆——所以這一切；都是當時中央運用民族聯合戰線策略的具體表現。

中國共產黨採取民族聯合戰線的策略，是完全自覺的。他之所以採取這種策略，首先就是爲的中國人民的利益，即是爲的打擊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爲的爭取中國人民的政治自由和改善他們的生活地位。

雖然因爲民族資產階級叛變和離開了國民革命（一九二七年四月），民族聯合戰線的策略沒有給我們預期的和應有的結果，但是，在當時發生的一切偉大的反帝反軍閥的政治事變中，共產黨員曾經表現出英勇奮鬥和不怕犧牲的模範。例如：在「五卅」事變中，在省港罷工中，在平定商團，討伐楊劉和討伐陳炯明的東江戰役中，在北伐中，特別是在佔領南昌的慘酷戰鬥中和佔領汀泗橋的血戰中，在收回漢灘英租界的羣衆行動中，在反對張宗昌和孫傳芳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中，中國共產黨員在實際上向中國人民證明了，他們爲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的無限忠誠和堅強意志。

當農民運動發展成爲千百萬農民的土地革命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在新的革命階段的基礎上，——即是在土地革命的階段的基礎上，繼續爲解放中國人民而鬥爭，中國共產黨把土地革命看作是動員和吸收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農民去實行民族解放鬥爭的方法，沒有農民參加，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把土地革命看作是消滅中國封建餘孽的工具，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地主對農民的封建剝削，就是這種封建餘孽的經濟基礎；軍閥官僚制度，就是這種封建餘孽的政治反映和上層建築。中國共產黨把土地革命，一方面，看作是消滅帝國主義和封建餘孽奴役中國人民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的工具；另一面，把牠看作是造成中國人民真正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自由發展的前提底方法。總而言之，中國共產黨把土地革命看成是有全民族和全人民意義的事業，經過牠，可以把中國從數千年經濟政治文化落後情形中解放出來，同時，並且能造成使中國成爲現代的文明國家的條件。

正因為如此，所以中國共產黨在武漢時代，不僅自己宣佈實行土地革命的必要（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月在武漢開的黨的第五次大會），並且企圖推動武漢國民黨傾向贊助和擁護農民土地革命的道路。

因為汪精衛叛變和左派國民黨離開革命，中國勞動群眾根據其本身的政治經驗，更加相信共產黨員言行的正確；更加把中國共產黨看作是為解放中國人民而奮鬥的唯一的、最徹底的力量。

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之所以遭受了失敗，主要地是由於下列原因：

- 第一，帝國主義和封建制度在當時的力量比革命的力量還大些；
- 第二，民族資產階級和國民黨的叛變；
- 第三，中國軍隊的僱傭性，以及在軍官成份中地主軍閥份子的影響佔優勢；
- 第四，陳獨秀等在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中所犯的機會主義錯誤——特別是由於他們對於奪取國民革命軍及其軍官成份的工作，以及對於武漢工農和建立有共產黨員骨幹的真正的革命軍隊的工作，採取了最可恥的消極的和怠工的

態度，

帝國主義和封建制度在中國資產階級幫助之下，給與了中國人民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事業一個暫時的嚴重的打擊。然而中國共產黨員不顧一切恐怖和壓迫，不怕一切艱難和犧牲，在最困難最艱苦的條件之下，繼續進行組織勞苦羣衆的工具。準備爲新的光明的幸福的中国而戰鬥的革命新高潮。

三 爲蘇維埃政權而戰鬥的九年

武漢「左派」的轉變以後，在革命營壘中剩下的，只有工人農民和城市貧民。暫時得到勝利的反革命力量，對於革命的勞苦羣衆以及革命的學生和智識份子，尤其是他們的領導者——共產黨員、採取了「斬盡殺絕」的空前未有的白色恐怖的政策，同時，在共產黨員領導之下的工農，不僅不願不戰而降，而且用盡一切方法企圖保持革命既得的勝利和向前推進革命的事業。在那些工農羣衆革命鬥爭特別發展的區

城（如鄂湘贛粵等省），開展了廣大反對反動軍閥和地主的游擊戰爭，在那個時候（一九二七年秋冬兩季），農民武裝起義的地點是很多的；然而在全國革命形勢低落和殘酷武裝進攻情形之下，只有很少的地方能夠抵抗敵人的進攻和鞏固自己的陣地，這些地方不僅有强有力的農民組織和羣衆運動，而且有相當的革命軍隊作爲武裝力量的核心，同時，特別重要地，在這些地方，有那些天才能幹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作領導，例如舉世共知的毛澤東、朱德、彭德懷、黃公略、賀龍、方志敏等同志。一方面，由於在革命勝敗過程的痛苦經驗中，深刻認識了政權機關和武裝力量的偉大作用和意義；另一方面，由於保證順利進行自衛鬥爭的必要和準備對敵人實行新進攻，在許多共產黨地方黨部領導之下的工農羣衆，在一九二七年的秋末冬初，自發地組織了蘇維埃政權的萌芽形式和工農紅軍的最初隊伍。廣州公社就是革命退兵時最大一次的武裝發動，同時是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工農羣衆，爲在蘇維埃旗幟之下解放中國人民的英勇企圖。廣州公社雖然遭受了嚴重的失敗，但牠所舉起的蘇維埃